

清代小说

李汉秋 胡益民著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皖)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 周荣显
封面设计 马世云

清代小说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李汉秋 胡益民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9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5,000

ISBN7—5336—0342—7/I·34

定价：3.60元

前 言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清代，已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自清初至鸦片战争的近二百年间，不仅产生了象《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辉煌杰作，同时，还产生了数十种流传较广的白话长篇小说，使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达到了最后的高峰。

本书在全面评述清代小说发展概貌的基础上，用较多的篇幅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部名作，冀能帮助读者提高阅读鉴赏能力。同时，对《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全传》、《阅微草堂笔记》、《樵机闲评》、《女仙外史》、《后西游记》、《斩鬼传》、《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玉娇梨》、《好逑传》、《镜花缘》等仍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而一般文学史、小说史又较少提及的小说，也作了较细致的评论，冀能使读者对清代小说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清代小说众体咸备，如何分类一直是研究者感到棘手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先把文言短篇小说列为二、三章，第四章以下的白话小说则参照鲁迅先生的分法而略加变通，不妥之处，期予匡正。本书不求与时贤显立异同，只作平实的介绍；更不求为了表明自己做过一点资料的搜罗工作，硬将文学古董作为文学古典塞给读者。凡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的作品，即使过去很少被人提及，我们也提出加以评述；凡我们看

来不值得一提的作品，就一概不提。在撰写时，我们吸收了一些海内外学者研究的新成果，谨在此表示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申谢忱。

本书第一、二、三、四、五、七、九章由胡益民撰写；李汉秋撰写《儒林外史》章，修改《红楼梦》章，并负责全书的通稿。汤书昆执笔第八章。

作 者

丁卯冬于安徽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叙论	1
第一节 古典小说的高峰时代	1
第二节 清代小说的几个基本主题及其背景	4
第三节 清代小说在艺术上的进展	10
第二章 文言短篇小说(上)	18
第一节 概说	18
第二节 清初的传奇体小说	21
第三节 《谐铎》和《萤窗异草》	24
第四节 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29
第三章 文言短篇小说(下)	
——《聊斋志异》	38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	38
第二节 “狐鬼史”中提出的社会问题	45
第三节 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典范	63
第四章 英雄传奇	79
第一节 《水浒传》的“续书”	80
第二节 《说岳全传》	94
第三节 说唐系列及其他	100
第四节 英雄传奇之蜕变——侠义公案小说	109
第五章 社会批判小说(上)	112

第一节	《梼杌闲评和《女仙外史》	112
第二节	《后西游记》和《斩鬼传》	123
第三节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	130
第六章	社会批判小说(下)	
	——《儒林外史》	142
第一节	吴敬梓的叛逆道路	142
第二节	儒林命运的历史反思	148
第三节	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	163
第七章	言情小说(上)	181
第一节	概说	181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及其成因	186
第三节	《玉娇梨》和《好逑传》	189
第四节	才子佳人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193
第八章	言情小说(下)	
	——《红楼梦》	195
第一节	《红楼梦》的时代和作者	196
第二节	以幻作真——《红楼梦》的哲理意蕴	200
第三节	情的高扬——《红楼梦》的审美理想	210
第四节	理的反思——《红楼梦》的社会批判	224
第五节	《红楼梦》的续书和“脂评”	236
第九章	《镜花缘》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	240
第一节	李汝珍的生平与时代	240
第二节	《镜花缘》的社会批判主题	242
第三节	《镜花缘》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古典小说艺术的实践性	
	总结	252
第四节	余论	258

第一章 叙 论

清代(1644—1911)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仁心”、“仁政”与野蛮、血腥，励精图治与空前腐化，社会生产的相对发展与封建制度的畸形延续，开疆拓土的壮举与外侮危机的总潜伏、总爆发，整理古代文化的杰出成就与毁灭文化的惊人罪恶……千秋功过，难于简单评说。

本书拟介绍这个充满矛盾的朝代在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以前的小说创作情况。在进入正题以前，先就了解清代小说的成就颇关紧要的几个问题作一总体说明。

第一节 古典小说的高峰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视小说为洪水猛兽，利用政治手段来强行禁黜的情况，以清代最为突出。自顺治至道光，几乎每个皇帝当政期间，都要亲自发布谕旨，来“严禁淫词小说”。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①；康熙四十八年，议准禁淫词小说^②；五十三年四月谕礼部：“朕惟……欲正人心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

^①俞正燮：《癸巳存稿》。

^②同上。

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盪惑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着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①；乾隆元年，“复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放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②；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三次“谕旨”禁毁小说，“不准再行编造”^③；同治七年一次列入禁毁书目的就达二百六十九种之多^④，本书将论及的《红楼梦》、《女仙外史》、《梼杌闲评》等都在禁毁之列……

在中国历史上，正统文人以小说为仇寇，以最恶毒的语言加以诅咒的，也以清代为最：梁恭辰说：“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刊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⑤；曹雪芹“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⑥。陈其元说：“《红楼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

①《康熙实录》五十三年四月，转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

②③俞正燮《癸巳存稿》。

④参见阿英《关于清禁淫词小说》，载《中国俗文学研究》。

⑤梁恭辰《劝戒四录》。

⑥梁恭辰《劝戒四录》。

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矣”①……

然而，也正是在清代，中国古典小说在一片禁黜、诅咒声中，进入了它的全面成熟期，在创作与批评的质和量方面，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所不曾达到的水平。

一、创作

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是源于六朝“志怪”、“志人”而盛于唐的文言系统，一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白话系统。清代以前，这两个系统基本上是此起彼伏，没有得到平行发展：唐以前是文言小说的时代；宋、元、明是白话小说的时代，文言小说只是微波余绪。在清代，这两个系统则互相吸收又平行发展，各自达到艺术上的最高峰。自清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清代文言笔记小说的总数在二百种以上②，约占清代小说总数之半。这其中虽有相当多属于一般掌故丛谈之类，但有特色的小说体作品在数量上是远超前代的。在艺术上，以蒲松龄为杰出代表的拟唐派作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大大发展了前代文言小说的体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典范。白话长篇小说至清代已完全踏上文人独立创作的轨道，产生了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精华之大成的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美之处（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文化的种种落后、愚昧之处也得到了最深刻、无情的暴露。在这个

①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②参看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第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高峰之后，古典小说也随着整个传统文化的没落而渐趋式微了。

二、批评

一种艺术的成熟一般总要体现在理论形态——艺术批评上。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期，也是小说批评的成熟期。

中国小说自产生以来就在统治阶级的压制、歧视中艰难地成长着，正统文人视小说为壮夫所不为的小道末技，更谈不到在理论上对它进行了研究。直到明末，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才有李贽(1527——1602)、叶昼(?——1624)、冯梦龙(1574——1645)等几个“叛经逆道”的文人，一反传统偏见，积极评点小说，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呐喊助威。以此为起点，清代的小说批评，名家辈出，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如金圣叹(1608——1661)评点《水浒传》、毛宗岗(生卒不详)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1669——?)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卧闲草堂评点《儒林外史》、但明伦评点《聊斋》……他们的理论批评活动不仅为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同时，还以其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中国小说的审美特征等重要理论问题的系统总结、阐发，指导了创作，为清代小说的繁荣和成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二节 清代小说的几个基本主题及其背景

以把封建伦常本体化为根本特点的程朱理学，自它以成熟形态出现(以朱熹为标志)后，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拖住历史前进脚步的灾难。

元、明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每一点进步意识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对程朱理学这个巨大哲学幽灵的对抗联系在一起。

清代取明王朝而代之，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悉承明制”，如恩格斯所说，这本是野蛮民族入主比它先进的民族时的一种历史必然。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封建中央集权制，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在官方哲学方面的“悉承”，却面临着尖锐的选择：其一，北宋以后，虽然结束了魏晋至唐意识形态领域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道统得以重建，程朱理学也曾被宋理宗、明太祖“钦定”过，但却并没有真正取得普及全国、独占思想界的地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的阳明心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①，“天下好称守仁者十之七八”^②，而“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③。按历史的次序，出发点同于程朱（为封建伦常寻找“本体”根据）而归宿地却有可能通向近代的阳明心学体系；是横在新王朝面前的第一个选择对象。其二，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诸人为杰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操戈入室，在儒学内部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至巨的理学批判运动，从理论上宣布了理学的解体，经过他们的批判，“理学是决定的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④

清初几十年间，统治者忙于马背征战，系统地“钦定”官学的任务便落到了亲政后的康熙身上。

康熙自幼学习汉文化，研读儒家经典。他从浩瀚的儒家经

①《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②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

③《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序》。

④杜国庠《便桥集·论理学的终结》。

典中，选中了程朱理学这个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自汉以来，儒者辈出，……(惟)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①；“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达理，凡所著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②因令将朱子升配孔庙，“序为十一哲”；谕李光地等将“《朱子全书》、《四书注解》刊刻告竣，可速颁行”，同时传令九卿，“有明于性理实学之人，各举所知”^③。就这样，早已成为历史的桎梏、按照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绝不可能死灰复燃”的程朱理学，终于依靠政治强力的保护，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任何人不得疵议的神圣权威，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而攻之”^④。

程朱的思想为什么使得康熙如此推崇备至呢？康熙五十六年，他在为《御制〈性理精义〉》所作序言中，对此有明确的吐露，序云：“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于理道之言，尤所加意。临位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⑤很显然，程朱理学之所以在康熙心目中那样确然不可移易，是因为他一眼看出了“性理之学不外循理也”这一根本特点。理学家把现实伦常秩序的“应该”本体化，并把对现实伦常秩序的遵循、体认（“循理”）与人的本质（“性”）的实现合而为一，为“天理”找到了人性的根据，才使得这位深谙人君南面之术的皇帝赞赏

①《康熙政要》卷十六。

②《康熙实录》卷13。按，《东华录》及《婺源县志》所记文字略有出入。

③《康熙实录》卷二五六。

④朱彝尊《曝书亭集》。

⑤《性理精义》卷首。

不已。这表明康熙之选择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是在充分认识到程朱学说的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

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①。自清初至康熙中叶的五十余年间，顺、康二帝的各种努力都以重建和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为中心。康熙对程朱学说的理性选择是其统一“天下大权”诸措施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康熙说过：“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②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工作必须以意识形态的统一为辅助。擒鳌拜、平三藩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斗争使他认识到征服人心的工作不可忽视；江南人民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更使他感到寻找一种为封建专制统治作论证的理论支柱的迫切需要。康熙中叶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淡化，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对付在清王朝治下的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主要任务已不在于明“华夷一家”的大道理，而在于使他们从理论上相信封建制度的合理和永恒，使他们心悦诚服地遵从“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的“天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汉儒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体系的粗糙说教固然缺乏力量；阳明心学把“天理”与“心”等同起来更会使“天理”失去神圣色彩，从而走向崩溃。在他看来，能承担起这一“时代重任”的惟有朱子之学：“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③

康熙在几十年的统治实践中“体贴”出来的尊奉程朱为思

①参见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版第三版序》。

②《康熙实录》卷二七五。

③康熙《御纂〈朱子全书〉序》。

想正统的“政要”，在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那里仍一脉相承。雍正二年，雍正谕将理学家尹焞、陆陇其等人从祀孔庙^①。雍正七年六月，锡保参奏谢济世从《礼记》本，而不从朱熹《四书集注》本注解《大学》，“诽谤程朱”，雍正当即表态，命内阁议谢济世之罪，十二月定案，将谢交锡保处理，令其“当苦差效力赎罪”^②。至于自称“从不以文字罪人”的乾隆，就多次严令，凡书籍中有违悖程朱之语，要统统作速销毁，并以“诽谤程朱”的罪名，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乾嘉之际，虽有所谓“专门汉学”的兴起，但专门汉学相对宋代的理学而言，只是“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③，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神圣地位。迨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忧内患迭起，程朱理学才同它赖以附丽的清王朝一样，渐渐失去了它控制人心的力量。

清统治者完成了有明一代所未能完全完成的任务，即真正确立程朱理学的一尊地位，把皇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威权推向极端。然而，由皇帝“钦定”意识形态的做法虽能收一时的政治之效，却不能真正抹平文化发展潮流的演进轨迹。在一片“钦定”、“御纂”的历史氛围中产生的清代小说（特别是个人独创的小说）的几个基本主题，都直接与程朱理学的理论死灰针锋相对：

一、反八股科举

清统治者定理学为官学，用“八股”作为科举制度。理学和八股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在清代小说中，从《后西游记》、

^①蒋良骥《东华录》卷二六，424页。

^②同上，卷三十，506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一节，70页。

《镜花缘》等对智能被毁坏的迂腐儒生的揶揄、嘲笑，到《聊斋志异》对科场弊端的诅咒、抨击，到《儒林外史》、《红楼梦》对科举制度的深沉反思和激烈否定，反八股倾向便形成了一个脉络分明的清代小说主题系列。

二、反性理空谈

程朱理学——特别是经康熙“钦定”的程朱理学，是纯粹的“尽性”、“循理”之学。在那里，“天理”是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常规范，也是宇宙的法则、自然的规律，因此，“循理”——即对封建秩序的体认、服从，同时也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循理”、“格物”、“尽性”异名而同义。理学的这种逻辑结构决定了它在价值观念上重“内圣”、轻“外王”，崇尚性理空谈，鄙弃实学和事功。在清代小说中，《女仙外史》、《儒林外史》都以原始儒家学说为武器，对程朱之学以性理空谈相尚的价值观念作了尖锐的指斥和否定。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批评宋儒，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批评它“坐谈性天”，视礼、乐、兵、农为末节的空疏之弊。

三、反禁欲主义

人性论是理学体系的核心和归宿。程朱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①，“天理人欲，不容对立”^②因而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途径来达到人与社会的适应和协调，自然人性被驱逐出了“人性”的“理想国”。这种“天理人性论”的直接受害者是广大下层人民和处在社会最底

^②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上注》。

层的广大女性。元、明以来，在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戏曲中，对“天理”的怨愤、抗争之声一直不绝如缕，至清代小说中，这种抗议之声达到了最强音。《女仙外史》、《儒林外史》都以原始儒学的人道主义温馨来与程朱人性学说的苛刻、残酷相对抗；《聊斋志异》以非现实题材，把在现实生活中为“天理”所压抑、所不容的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托之狐仙鬼怪，以尽情地传达出来，并作了诗意的渲染和热情讴歌；《红楼梦》则在更高的理性自觉上揭示了天理人性论的荒谬和虚伪，并在肯定“情欲天成”的基础上对人性的社会性内容作了深刻的辨析，同时对理学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本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判决。以“人心”反抗“道心”，以“人欲”反抗“天理”，要求自然人性的发展，这是清代小说中最常见的、也最有生气的主题。

上述清代小说的基本主题，体现着中国文化向近代演进的鲜明意象，它上承明清之际以反理学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批判思潮，下启近代文化改良运动。当清王朝统治趋于稳固，文字狱大盛，社会批判难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时候，正是一批准确地把握着时代脉搏的清代小说家们，用艺术的语言，艰难、曲折地表现着时代精神，向近代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第三节 清代小说艺术上的进展

关于清代小说具体作品在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以下各章将分别述及，这里只从小说观念演变角度，就总体趋向上对清代小说与前代小说相比在艺术上的主要进展，略作讨论。

中国白话小说直接脱胎于宋元时代在瓦舍勾栏里成长起

的“说话”艺术，而长篇章回小说更从一开始就与说话中的“讲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小说第一个高峰时代在明朝前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几部著名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便都是一些历史故事经过说书人几百年间交口相传、不断扩大丰富，而后由文人加工改写而成的。至于那成熟较早的文言短篇小说，原先本来就是史书的一个支流（“稗官”，“野史”，“杂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著录志怪小说，就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归入史部，后代的不少目录学著作也把文言小说归入史部。而在文人学士们的书面语言里，“稗官野史”就成为“小说”的代名词了。

按照现代的小说观念，小说乃是一种虚构艺术（在英语中，“虚构”与“小说”本来就是同一个名词“fiction”）。我们考察它的真实性，是考察它是如何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即虚构得是否合情合理，而不是问它是否“于史有据”。中国古典小说由于它脱胎于历史的史实，一开始就形成了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小说意识。在较早的中国小说中，作者对小说所写的事实兴趣显然比对小说本身的兴趣要浓厚得多。且不说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一类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朝代籍贯、行踪本末都交待得一清二楚，就是那并非都是关于历史题材的“三言”，其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无“来历”，“这些人物大多数要么是历史或民间传说中的知名人物，要么是与某个谋杀案或桃色事件有关”^①，故事讲述者试图以此向读者保证他的故事的可靠性。

如果说是历史促进了小说的诞生，那么同时可以毫不含糊

^①[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P.16,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